



上海的故事

第三册

2.5
87

上海的故事

第三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三册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68,000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书号 4074·409 定价 0.22元

编 者 的 话

上海,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为了使新社会里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使旧社会里过来的人,不忘过去,温故而知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曾出版了《上海的故事》(共六册)。这套书所收集的文章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和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那种“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激励我们去创造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也发挥着它的应有作用。粉碎了“四人帮”,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我们把过去出的这套书整理成四册重新出版,在内容上也作了若干增删。我们今后还准备将这套书继续编下去,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一工作。

目 录

越界筑路·····	天然(1)
帝国主义与上海邮政·····	高仰止(16)
帝国主义盗窃我国气象情报的徐家汇天文台·····	冰谷(31)
美国摩根财团控制下的上海电话公司 ·····	文圻 孝悌 仰止(44)
从“棉虫”川村到“内外棉”·····	米方(56)
哈同与哈同花园·····	房祥(66)
逸园跑狗场·····	房祥(71)
雷文和滑头银行——美丰银行·····	谢菊曾(80)
血泪的控诉——“江亚轮”事件·····	尚岗(90)

越界筑路

天 然

帝国主义在上海“越界筑路”，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严重蹂躏和侵犯。

所谓越界筑路，是越出“租界”修筑道路的意思；帝国主义者在上海通过越界筑路，非法侵占了几万亩土地，对上海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所以，要谈越界筑路，先得从构成罪恶渊藪的“租界”谈起。

从帝国主义的“租界”谈起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上海道台在英国侵略者的胁迫下公布了一个《地皮章程》。根据这个章程，英国侵略者勒索到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现北京东路）以南这一地区为他们的居留地，准许他们在这里按一定的手续租赁土地，建屋居住。另外，还规定了一些外人居留应遵守的法令。这样，居留地的南界与北界都已划定，东面是黄浦江，算天然界限，只有西边没定下来。第二年九月，又议定西边至界路（现河南中路）为止。这一块地方，面积约有八百三十亩，也就是最早人们所称的“英租界”。

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一到上海就蛮不讲理要求扩大租

界。一八四八年，上海道台麟桂，被迫同意将英租界西面从界路扩展到泥城浜（现西藏中路），北面从李家庄伸展到苏州河南岸。扩大后的面积达二千八百二十亩，比原来增加了两倍多。

一八四八年美国殖民主义的急先锋——传教士文惠廉（一般人称他为文监师），在上海虹口地区擅自广置土地，非法建造教堂，并且横蛮无理地要求上海道台答应以虹口一带作为“美租界”。为了造成既成事实，美国侵略者还在那里搞了码头、船坞和酒吧间。

一八六三年英美侵略者在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感到把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起来共同管理更为有利。但是，美国侵略者当初在虹口擅自设立租界的时候，四周并没有正式划界线。这时，美国领事熙华德便迫使上海道台议定美租界的界址，它的四周是西面从泥城浜对岸西藏路的南端起，向东北斜伸到老靶子路（现武进路），再向东划一直线到杨树浦高郎桥为止。这样，位于苏州河北岸的一个辽阔地区便成为“美租界”。同年九月，英、美两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在一八七三年及一八九三年之间，美国侵略者又借口一八六三年划定美租界时没有正式树立界石，又肆无忌惮地扩充租界，等到一八九三年双方派员实地勘察，树立界石时，界内面积已扩充为七千八百五十六亩，加上苏州河南岸的英租界，使这时的所谓公共租界总面积达一万零六百七十六亩。

一八四八年法帝国主义派敏体尼为驻上海领事。他到上海后，立即和已经在上海的法国侵略势力的先遣部队——天主教传教士勾结起来，通过法籍主教赵方济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一八四九年四月，

上海道台麟桂在敏体尼的一再胁迫下，发布公告，规定南至护城河（现人民路），北至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东至潮州会馆（现龙潭路），沿黄浦江至洋泾浜东角，西至关帝庙褚家桥（现西藏南路附近）为“法租界”，全部面积共九百八十六亩。

一八六一年，法帝国主义又迫使清政府把十六铺新开河一带共一百三十八亩土地扩充为法租界，使法租界的总面积达一千一百二十四亩。

租界最初划定时，根据一八四五年的《地皮章程》，中国仍保留对领土的主权，租界内土地只能“承租”，不能买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还保有干预权。但是英、美、法侵略者的对华侵略是逐步深入的，他们对当初订立的《地皮章程》不断作有利于他们侵略的片面修改，以致使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渐被侵犯，租界也就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包庇走私、贩售鸦片、土地投机和吮吸中国脂膏的罪恶场所，成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基地。但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仍然得寸进尺，不断向租界以外扩张，扩张的主要步骤就是“越界筑路”。

从开始筑路到疯狂扩张

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无法无天地越界筑路，开始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一八六〇年，美国殖民主义者华尔组织所谓“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华尔就借口军事需要，在租界以外强筑所谓“军路”。华尔被英勇的太平军在浙江慈溪击毙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继任，他也以军事运输为理由继续越界修筑“军路”。从一八六〇——一八六五年，公共租界

方面经由华尔、戈登及其他冒险家越出租界所筑“军路”计有新闸路、麦根路（现淮安路）、徐家汇路（后改名为海格路即现华山路）、极司非而路（现万航渡路）、吴淞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杨树浦路等七条。太平军战事结束后，至一八六六年，公共租界统治机构工部局立即侵占这些道路，设立警岗，征收捐税，把这些地方看作为租界的一部分。清政府看到帝国主义协助它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有功”，也就只好装聋作哑，采取默认的态度，把这些地方作“报酬”，让给帝国主义。

原来，按照当时《地皮章程》的规定，租界范围以内，外人只可永租土地，建屋居住，不能以所租土地、所建房屋作为营利手段，租界以外的中国人也不能迁入界内居住。这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华洋分居”。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这时城中地主、富商纷纷迁入租界居住。利用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也就不顾《地皮章程》的规定，公然租地造屋，然后转租，从中获取暴利。一八六〇——一八六二年，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租界内的人口更陡增到三十到五十万人。这样一来，“华洋分居”的局面就被打破，形成所谓“华洋杂居”。在“华洋杂居”的局面下，帝国主义便找借口进一步加强殖民统治机构，变“码头道路委员会”为“工部局”，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帝国主义淘金分子除了在租界内强占地皮，建造房屋，通过地产投机与高额房租压榨中国房客以外，还利用各种名义向租界内的中国人征收苛捐杂税。单以地税而论，一八六九年为一万三千多两银子，通过越界筑路扩大租界后，到一八九九年，即剧增到十八万八千多两银子。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英国和美国两个帝国主义继镇

压太平天国革命、强筑“军路”之后，又在公共租界之外强筑了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派克路（现黄河路）、马霍路（现黄陂北路）、坟山路（现龙门路）等。在一八九〇年前，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长度总计约四十华里。一八九九年，英、美帝国主义便胁迫清政府承认公共租界的界线，其西面由西藏中路扩展到静安寺附近，东面由杨树浦推展到顾家浜（现平凉路军工路交接处），扩充面积达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七亩，连前合计公共租界面积达三万三千五百零三亩。以前的越界筑路都被划到租界内去了，英、美帝国主义以越界筑路作为扩充租界的阴谋步骤，也暴露得更清楚了。

法国侵略者也不甘落后，他们利用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时机强筑的一条“军路”便是徐家汇路，这条路于一八六〇——一八六二年由法国侵略者派出侵略军荷枪实弹，强筑而成，强筑时，随意拆除农民房屋，强占农民土地二百多亩，使不少农民流离失所。一八六四年法租界公董局又借口要修建公墓，公然在界外八仙桥附近迫迁农户，侵占农田六十多亩作为公墓（俗称法国坟山，现改建为淮海公园）。自此法国侵略者就在八仙桥一带向西扩展，一八六五年在周泾浜造桥强筑恺自尔路（现金陵中路），这是法国侵略者越界筑路的第二条。一八八九年强筑了八仙桥街（后改名爱来格路，现桃源路东段），一八九二年又伸展了宁兴路（现宁海东路）和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一九〇〇年法帝国主义胁迫清政府扩大法租界，由八仙桥伸展到重庆南路北段一带时，这些越界筑路几乎全部都被划到租界内去了，只剩一条徐家汇路越出界外，还未划入租界。这次扩充的面积为一千零二十九亩，连同原来的法租界一千一百二十四亩，合计起来法租界面积已达二千一百五

十三亩。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其他各帝国主义也纷起效尤，他们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制成商品，再以高价卖给中国人民。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这一新的情况，更进一步助长了帝国主义通过疯狂的越界筑路来不断扩大租界的罪恶活动。

一九〇四年，工部局在北区勾结地保，强占民地，筑成了北四川路、黄陆路（现黄渡路）、江湾路。一九〇六年在北四川路一带越界地区，派出武装巡捕，将所有华洋房屋钉上门牌，开始挨门挨户强征捐税，从而把租界势力伸展到天通庵路、虬江路、邢家木桥等处。当时那一带居民，无不义愤填膺，群起反对。他们一面向工部局表示坚决抗议，一面拆毁了帝国主义者所擅自钉挂的门牌。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无耻的工部局竟出动大批巡捕进行武装镇压。同时，他们还偷偷搬动北苏州路界石，延长北苏州路从西藏路桥到新闸桥一段。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工部局眼见中国国内局势尚未稳定，于是又抓住机会趁火打劫，通过越界筑路来进一步扩大租界范围。在这一年内，工部局将界外的涌泉浜填塞，延长静安寺路；将柴长浜填塞，修筑大西路（现延安西路）；将田鸡浜填塞，拟筑愚园路。工部局填塞这些河浜，大大破坏了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当地农民曾大力展开斗争，同时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上海交涉员”几次提出抗议和交涉，但野蛮的帝国主义一概置之不理。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工部局所强筑的还有窦乐安路（现多伦路）、施高塔路（现

山阴路)等六条越界马路。其后几年又续有扩展。

一九二四年正是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爆发战争,战火延及上海郊区。此时工部局又故意虚张声势,借口“保护租界内的安全”,兴筑开纳路(现武定路),同时圈占沪西蒲松区境内纵横十余里地面,强筑了凯旋路、林肯路(现天山路)等十二条马路。自一九〇一年起,到一九二五年止,英美帝国主义在上海非法所筑的马路还有欧嘉路(现海伦路)、狄思威路(现溧阳路)等十条,前后总计共达三十七条,总长度约达一百五十华里。

工部局在界外强筑了这许多马路之后,曾进一步向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扩大公共租界到越界筑路区。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取得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在一九一五年也已基本同意,并搞了一个合并草约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但由于帝国主义忙于世界大战,事情也就搁了下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收回租界。这就使得当时的卖国政府有所顾虑,不敢贸然同意帝国主义扩大租界的要求。所以英、美帝国主义再一次扩大租界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一时期,在法租界方面,法帝国主义也进一步乘机大搞越界筑路。一九〇一年,公董局首先在界外强筑宝昌路(现淮海中路)等三条马路,一九〇二年又强筑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等六条马路,一九〇七——一九一四年间,又非法强筑了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等。仅仅十四年之间,法帝国主义在租界外强筑马路达二十多条,凡是越界筑路所到之处,也就是公董局的警察权、管理权所到之处。

法帝国主义这样疯狂地强行非法越界筑路，显然是为扩大租界造成既成事实。果然，到一九一四年法帝国主义便勾结窃国大盗袁世凯，将这广大越界筑路地区正式并入了法租界。这片越界筑路区的总面积为一万三千零零一亩，为一九〇〇年法租界面积二千一百五十三亩的六倍多。

帝国主义越界筑路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扩张租界、压榨中国人民的一个手段，而租界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要侵略中国，需要扩大它的侵略据点，要扩大它的侵略据点，就疯狂实行越界筑路。越界筑路的过程也是帝国主义对上海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掠夺过程。筑路所需用的经费绝大部分是由工部局、公董局在它的收入项下拨出的，但是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收入都是用捐税形式从中国人身上搜括去的。筑路所需的材料也无一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筑路所需的人力更不消说，不是上海的工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从这些情况来看，帝国主义越界所修筑的马路不下几百条，但每一条都是上海人民自己修筑的。上海马路之形成，丝毫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功德”，它完完全全是上海人民自己血汗的结晶，是自己劳动的成果。

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

一九一二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做总统，法帝国主义者们认为时机到了，便立即进行扩张租界的活动。一九一二年六月二日法租界公董局决议：

“……本董事会鉴于现在的情势和公共租界当局积极扩张的态度，爰决议：要求法国驻沪总领事，立刻正式提出推广

法租界的交涉……”

到一九一三年，法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康德正式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扩张租界的要求。但此次扩张租界，法帝国主义不提“扩界”字样，而以划清界外马路“警权”为名来达到扩张的目的，手段是极其狡猾的。这时，窃国大盗袁世凯正企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国内革命势力，实现他做皇帝的迷梦，因此，一听说法帝国主义有扩大上海法租界的要求，便表示同意，但附带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就是要求法租界公董局驱逐和引渡革命爱国人士，为他在租界内镇压革命势力开辟道路。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六日，袁世凯卖国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所写的一份报告中，对这一点有极明白的供认，他说：

“……查上海法租界外马路（即越界筑路区）划清警权一事，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法国驻京公使康德，曾迭照请本部，商量该处中法警察权问题。……迨至本年春间，法使复频来催办。……法使所请，有未能终拒之情。又因比年以来，乱党（指当时的革命爱国志士——引者）出没租界，依为护符，虽经官府指名索交，而外人辄以国事犯为辞，不允拿解，以致任意妄为，无复顾忌；今法使既阳以划清警权为名，而阴行扩充租界之实，计不如因势利导，承认其已辟之路，归法国警察管辖，而于界内藏匿之乱党，要求其分别驱逐拿交，以清乱源，而弭隐患；因飭特派员杨晟酌度现情，博采舆论，就近与驻沪法总领事商议合同条款，呈部核夺，一面由本部与法使晤商取缔乱党办法，以期迅速藏事……”

看了这个“外交总长”的这一供状，就晓得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他的政治黑帮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明知道法帝国主义以划清警权为名，图扩充租界之实，但是他们仍觉得

不如“因势利导”，用奉送国土的办法来请求帝国主义帮助他们镇压租界内的革命势力。袁世凯卖国政府抱着这样一个罪恶目的，因而与法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康德的买卖，很快就拍板成交。具体条件就是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东自现在的肇周路及重庆南路北段，南自斜桥徐家汇路沿河，西自华山路，北自延安中路之间的几十条越界马路，归法帝国主义管辖，法国方面则允将租界内的革命爱国人士驱逐或拿提引渡。袁世凯卖国政府的“外交部”在承认把全部越界筑路的警权送给法帝国主义之后，于一九一四年四月七日对法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康德提出声明，要求法国政府不得以法租界及外马路区域作为反抗袁世凯卖国政府的根据地，也不得为“乱党”的避难所，如果发生上述情事，法租界巡捕应严行查办、拘禁、驱逐或引渡给袁世凯卖国政府。

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这个声明后，法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康德立即复照，表示完全同意照办。这样，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法帝国主义之间的一笔肮脏交易就成交了。

地产投机和疯狂的土地掠夺

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进行地产投机和土地掠夺的大好机会。从越界筑路的整个过程，说明帝国主义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渗透了讹诈、欺骗、投机、掠夺等臭不可闻的东西。那么，地产投机和土地掠夺的状况到底怎样呢？越界筑路与它们的关系又怎样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里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的性质和组织简单地说一下。公共租界工部局是

英美等帝国主义驻沪领事直接领导的，是一种殖民统治机构。工部局是租界行政机关，是个市政府设置，它的中文名字不称为市政府，是别有用心的，好象它只是搞些道路工程等，这样就可以掩盖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实质。这个殖民统治机构的行政组织叫做“董事会”。董事由“纳税西人会”选举产生。这个所谓“纳税西人会”，就是在上海占有大量土地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地主会。它具有很大的权力，俨然是租界的“立法机关”，那些外国大地主和房地产投机商，不仅直接控制着“纳税西人会”，而且有些人自己就是工部局的董事或总董。法租界的公董局是由法帝国主义驻沪领事直接领导的，它的组织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同小异。工部局和公董局既是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机构，又是外国房地产商进行投机剥削的“御用”工具。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也是帝国主义房地产投机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外国房地产投机商掠夺土地，一般是走在越界筑路之前的。因为他们都是工部局或公董局的人，或者是和它有关系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和策划越界筑路的阴谋诡计，拟定越界路线图。他们把越界路线图拟定后，就抢先在路线两侧，贱价侵占大量土地。他们这样“抢先”，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为工部局或公董局筑路找借口，说外国“侨民”在那里已经有了大量“产业”；另一方面是“抢先”侵占农民的土地，等到越界马路筑通，地价暴涨，短期间内可获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暴利。英商业广地产公司，知道工部局要越界强筑北四川路，它就预先在那一带，勾结地保，欺压农民，以低价侵占了五、六百亩土地。后来道路开通，地价大涨，便攫取暴利几百万两。“业广”在一九二六年将北四川路崇福里的八十八亩土地卖出时，每

亩卖价达一万四千五百两，共得价款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两。一九一六年“业广”在溧阳路侵占土地约二百亩，其中有一块土地一百四十五亩，当时帐面价值为三十五万两，到一九三八年，它将这处土地卖出时，竟得价款五百万元（内有房屋价值一百一十万元），约三百五十万两。又如工部局强筑愚园路时，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经理派克，从工部局方面预先知道了筑路计划图，他立即唆使这个公司的买办雷汲韩勾结当地地保及土地捐客十余人，组织抢占土地小集团，日夜紧张活动。他们按照计划路线图，分头向当地农民进行讹诈、恐吓、迫害、强买土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层层包”：派克把抢购土地的任务包给买办，买办包给地保，地保再包给捐客和地头蛇。象这样层层剥削，层层克扣，最后农民实际所得“价款”，也就寥寥无几了。这样，中国营业公司仅一个月光景即在愚园路（现乌鲁木齐路到江苏路一段）两侧，以每亩三百至六百两的价格，侵占了一百多亩土地。等到大量土地到手，派克又从压价收买转变到抬价收买，把那一带的地价哄抬起来，接着，工部局开始筑路，结果不到一年光景，那一带地价每亩涨到八、九千两到一万多两。这时派克就把抢购到的一百四五十亩土地卖掉一半，将所得价款就在抢购到的土地上建造里弄住宅，再以高价分宅出卖。中国营业公司仅在这一笔投机勾当中，即获得暴利一百多万两，而派克这个帝国主义冒险家在大发横财后，就携带大批现款和珍贵古玩“告别”上海，回美国去过他穷奢极欲的生活了。

法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地价同样飞涨。一九一四年十月四日法租界帝国主义的喉舌《中法新汇报》也作了如下的招供：“这界外马路的地方，实是处于一种最奇怪的形势之下。此